

从《国殇》出发分析《九歌》的创作意图及性质

李淑霞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历来学术界对《九歌》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对待《国殇》的问题上说法不一。有的学者主张将《国殇》从九歌中删去,有的则干脆认为《九歌》只是祭祀诗而无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国殇》入手来分析《九歌》,从而论证《国殇》不仅是《九歌》的一个部分,而且《九歌》的性质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不仅仅只是祭祀,而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国殇;九歌;性质与创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28-03

《九歌》辞采华美,充满浓郁的浪漫色彩,为许多文人墨客以及对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的人所钟爱,正由于《九歌》的创作风格明显不同于屈原的其他著作,故而历代关于《九歌》的著作权。有民间创作说、屈原改作说、汉人创作说等多种说法。而在这多种说法中,屈原改作说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因此本文是以承认《九歌》是屈原改作而立论的。

研究《九歌》的历代学者,往往从数字“九”出发来分析《九歌》,从而把《国殇》与《礼魂》排斥在《九歌》之外,认为它们是《九歌》的赘疣。宋代晁补之在《重刻楚辞·离骚序》中说:“汉书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离骚》、《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为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九歌》之后,又不可合十一为九。”晁补之从《汉书》所记屈原所作篇目的角度出发,将《国殇》、《礼魂》逐出《九歌》之门,不免主观而又略显证据不足。明代陆时雍在《楚辞疏》中明确提出“《国殇》、《礼魂》不属《九歌》。想当时所作不止此,后遂以附歌末。”这只是臆想之词,亦不足为据,令人难以信服,清代徐焕龙也从“九”这一数字出发来立论,他在《楚辞洗髓》中说:“《九歌》篇十一者,《国殇》、《礼魂》特附《九歌》之后,不在九数之中。”李光地《楚辞注》注《九歌》至《山鬼》而止,不将《国殇》、《礼魂》算入《九歌》之中,可见他也认为《九歌》不应包括《国殇》、《礼魂》。今人刘永济认为《礼魂》为乱辞,《国殇》则为屈原之《招魂》篇,误附于《九歌》之中的。

在古代的作品中,有时候数字并不一定是确指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传记载郑伯肉袒牵羊向楚献罪时说“……不泯其社稷,夷于九县……”解释“九县”时说“九县者,楚灭诸小县,皆以为县。郑国土地较大,非仅楚之一县,故云九县。九可以用作虚数,则九县犹言诸县耳。”同样,《九歌》之“九”也不

一定是一个确数。“九”是数之级,所以,从数字“九”出发来分析《九歌》证据不充分,而且没有说服力。

从内容上来分析,《国殇》描写的是一场严酷的战斗,它描写出了战争的残酷“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縶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也写出了战士的临危不惧。与《九歌》的其他篇章相较,在内容简介上以及祀神的方式上有明显不同。如祀天神中云神的《云中君》时,先写迎神前的准备工作:“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然后接着由饰神的主巫独唱,“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之后是群巫的送神之曲,以及对神灵的思念,结束送神。“灵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祀地祇之神《山鬼》也是如此。总之,祀前九神场面宏大,对祭神礼仪的描写以及祭品的陈设、祀神的歌舞活动、神的形象的描写、对神的赞颂、祈福以及某些留恋之情的刻画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都是按这几种方式来写,总体上是相一致的。基于这一原因,一些《九歌》研究者便认为《国殇》乃是错附,窜入《九歌》中的篇章,从而主张将《国殇》从《九歌》中除掉。

在《九歌》中之所以要祭祀国殇之魂,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无辜被杀者,是要复仇的,因而对先烈们的称颂,也传达出向敌人进行复仇的愿望。从《国殇》描写战争的特点可看出,结局是楚军失利:“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战士们在严酷的战斗中不但奋勇杀敌,而且死后的魂灵也是不屈的,“诚既勇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历代学者把《国殇》排斥于《九歌》之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关于《九歌》性质的众说纷纭。东汉王逸在《九歌序》中说:屈原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

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始创“托喻风谏”之说。南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更把“托喻风谏”说大肆发挥,几乎对每一篇都要诠释出“存君兴国”的微言大意。朱熹对《九歌》的解说,大体承袭了王逸、洪兴祖的看法,他在《楚辞集注》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褻慢淫荒之杂。屈原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念不忘之意。是以其词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朱熹认为《九歌》既是祭神之歌,又是屈原忠君爱国之作,在祭神中寄托了屈原的拳拳爱国之心。王夫之《楚辞通释·九歌序》中说“孰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祀之神,而委婉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怨。”王夫之把《九歌》看成单纯的祭祀乐歌,其中不含有屈原的个人感情。我们知道,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它总是涉及到一种意识反映行为,作者通过创作文学作品以表达他的感受,并试图以此唤起读者相应的感受。《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毛诗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荀子·乐论》中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这些议论都表达了文学作品是作家创造、作品反映作家内心情感的思想。南北朝时钟嵘在《诗品序》中起首就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作品作为“物之感人”的产物,它既是对“物”的世界的再现,也是对“人”的心灵的表现。而王夫之把屈原个人的感情排斥在《九歌》之外,单纯地把《九歌》看作是祭祀诗是不对的。清人马其昶认为:“假令屈原欲自言志,奚托于神,事神乃陈己冤结,其神渎矣!其身既疏远,更欲致其蔽罔不可驺晓之词以讽谏,何其过计者欤?”马其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载谷永之言曰:“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从而推定《九歌》可能是楚国宫廷举行祭祀所曾用过的乐歌,“必屈原承怀王之命所作”。马其昶批评了王逸、洪兴祖的“托喻风谏”说,也否定了朱熹与王夫之的说法。他认为《九歌》是屈原承怀王之命而所作的用于国家宫廷祭祀的乐歌。《礼记·乐记》论述乐的政教作用说:

是故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又说: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飧,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的作用如此重要,在一个“信巫鬼,重淫祀”的国度,祭祀具有的政治意义便不言而喻。《国语·楚语下》记楚大夫观射夫答楚昭王问,讲祭祀意义重大,其作用是‘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因此规格极高,‘天子亲春邠郊之盛,王后亲(左边叫四右边三品一木)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楚之先祖祝融、鬻熊,为楚成王所灭。《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与晋战于邲,‘祀于河,作先君宫,告事而还。’《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共王择嗣,遍祭‘群望’。从上述历史事件的记载中,可以证明《九歌》绝不是单纯的祭祀之歌,屈原作《九歌》也必定与国家政治有关。”联系屈原生平事迹以及思想,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屈原初登政坛之时,正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在列国兴起之时,楚国要想在列国中称雄,必须通过变法以壮大本国。所以屈原一再主张举贤授能,“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整饬法度,论功行赏,取消统治阶级的特权。而楚国当时的现状却与屈原的愿望相反:一方面旧贵族因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粪壤以充帙兮,谓申椒其不芳”,另一方面是“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或福助,却秦军”(《汉书·郊祀志》)。“面对楚国朝野上下淫祀成风、僭越相属的现状,屈原以此为契机,为宫廷祭祀制作乐歌,从文治的角度考虑,并为变法铺平道路。名之曰《九歌》,这正是屈原用祭祀乐舞的教化功能,柔性地改变楚国不良现状的尝试,也是他借此以使楚国朝野上下警悟,并进一步实行变法的美政理想的不可或缺的一步。”

考之屈原的作品,即使是作于行冠礼之时的《橘颂》,字里行间表达着他的爱国之情与报国之心。可以说爱国贯穿屈原的一生,也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种对国的眷念从他的思想中抽去,那屈原的灵魂也会飘散。故而《九歌》虽是祭祀诗,也必定与国家政治相关。《周礼·春官》中记大宗伯之职,其言曰: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邦国,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可见祭祀时必须祭天神、人鬼、地祇三端。《国殇》

所祭之神是人鬼,故而在《九歌》中有《国殇》之篇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九歌》是一组为国家祭祀而作的祭歌,屈原作《九歌》有他的政治目的。《国殇》是《九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82~83.
- [2]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6~47.
-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720.
- [4]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33~672.
- [5]张崇琛.楚辞文化探微[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204~210.
- [6]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9.
- [7]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0~114.
- [8]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M].四川:巴蜀书社.2004:74~77.

Intention and Nature of Nine Songs from National Martyr

LI Shu - xia

(Literature Institut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730070)

Abstract:There has been a lot of differences of opinion on the research of Nine Songs in academia circles, especially on the National Martyr. Some scholars advocated that we should delete National Martyr from Nine Songs. Others simply considered that Nine Songs is only poetry of festival withou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Nine Songs and to demonstrate that National Martyr is a part of Nine Songs an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author's creative intention are not only a worship, but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well.

Key words: National Martyr; Nine Songs; Nature and Inten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